

诗意人生

从前的人家

文/周亚娟

是路口涡漩的一抹江南
是心头弥漫的几许温柔
是旅程中有意无意的失足 迷迭
是梦里梦外锁不住的
悠悠乡愁

你垂钓一条河的灵动
我垂钓你握在手中的静谧
日头晴好的时候,能看见
一波一波的光阴,在流水里
缓缓东去

从峪口拐进去
缠绕着东一条西一条的山路
像长长的藤,上面结着一个个
名叫「从前」的人家
红透的柿子在檐下滴雨
慢腾腾的炊烟去约云云朵朵
还有两口不怕冷的山雀
在屋后的槐树上
你一言我一语,谈情说爱

(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



牧民

珠穆朗玛

文/图 于岗

珠穆朗玛

因为你的伟岸
我开启一段一段的路程

因为你的身影
我虔诚的一步一步靠近

我知道你在远方
所以不舍千里

珠穆朗玛峰
你在天地之间直立
得知天与地所有的讯息
你是天地间的一尊佛

看得见人世间所有的悲喜
你不声不语

因为你的高度无人能及
斗转星移

山就在这里
站在这神坛之上
满心诚意
敬长生天
敬承载万物的大地

(作者供职于陕西公路集团)



天路



珠峰

心灵后窗

文 / 张力峰

我生了一种想回农村的病

离开自小生活的农村,我已经在西安这个被称为“大堡子”的都市里生活了三十年,这个城市接纳了我,我也在这个城市留下了奋斗的足迹。但是,在深埋于心的情感中,我始终认为,我的身心是从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这座城市的。

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源于一场饭局,在觥筹交错的热闹和海阔天空的吹嘘之中,我听到街边音像店在播放一首歌曲:“光阴似箭岁月如烟,转眼过去已在城市多年,心中有梦我流泪流汗,喝杯啤酒以醉了红颜,多少真诚被撕的稀烂,金钱利益我把太多看穿,辉煌岁月朋友都在身边,落魄的日子无人雪中送炭,城里套路深我想回农村,城里的路太硬我踩不出脚印……”听着听着,不知怎地内心就生出了莫名的惆怅,就有了共鸣。打听之下,知道了这是歌手刘晓斌演唱的《城里套路深我想回农村》。

不是当日和我把酒言欢的朋友不好,他们待我都很真诚,也不是工作生活遇到了不顺,日子过得也算是阳光明媚,但饭局结束时,我是真的醉了。等回到家躺在床上,伴随着胃里酒精的燃烧,情绪上也泛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让我突然感到了疲惫、空虚、无助。同时,也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其中最出彩的一段话是这样的: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细思,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年轻时想出来,总觉得人生应该是壮阔的激烈的,认为外面天高地阔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挑战,到一定年龄了又想停下脚步回到自己的家乡过生活,去相伴父母和拥抱厨房,去过没有太大压力的安逸日子。从这点看,人潜意识里内心永远都是浮躁的,都是永远不知足的,始终都想追求自己缺失的,这可能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吧。

从学校毕业之前,我一直生活在陕南的一个小县城,幸运的是赶上了国家分配,所以有了稳定的工作。上班的节奏并不紧张,甚至是悠闲的,下班回家陪父母吃饭,心里是踏实的;无事时和朋友聚会聊天,日子是欢快的、惬意的。结婚成家后,生活于我成了一屋二人三餐四季,平凡之中透着安逸和满足,我怕自己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境地,于是在平静中内心隐隐的有了一丝躁动,就是想奋斗一个更大的天地。于是,闯入了都市,来到了省会西安,但随之而来的是,我体会到了生活上什么是“长安居大不易”,经济上什么是“长安米贵”,工作上什么是“压力山大”。

初入城市,白天看到的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人流涌动的商场超市,晚上看到的是霓虹闪烁,灯红酒绿,斑斓繁华。入夜时透过租住房子的窗口,看着万家灯火通明,心中便会产生阵阵感慨:这才是年轻人追求的生活,这才是年轻人应该为之奋斗的地方。那时的我,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燃烧的热情让人时刻都在为理想而奔跑,生活的节奏是忙乱的,一地的鸡毛都需要让人理顺了安放妥当。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在这个城市,是被时代发展的大潮挟裹着往前走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年轻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塑造性。当时的我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自己努力了,一定会全身心地融入这个城市。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竞争是残酷的,生活是残酷的。这些年来,为了曾经的理想,为了当下的生计,我匆匆前行,颠簸流离在陌生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曾经吸引我的高楼大厦,璀璨灯火,艳丽的绚灿,梦幻般的繁华,如今都成为了可有可无的“鸡肋”。都市的人潮车流中,我的身影愈发寂寥,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没有时间停下来赏悦城市的美景,没有机会享受城市的繁华,曾经的激情也慢慢被磨平的褪去了本来的色彩。在经历过成长的代价之后,台湾歌手郑智化的那句“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让我有了切身的体会,也让我感到了身心的疲惫。

我自己也明白,心态永远是人最好的风水,心一旦平静,外界就会鸦雀无声。虽然这座城市没有属于我的一席之地,但我必定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年,我应该用自己的心去焐热它,直到它真正地接纳我。于是我心里默念着:“巽微

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努力让身体仍像陀螺一样旋转在这座城市里。但思想和记忆是诚实的,无人陪伴的暗夜,时不时地会泪流满面。我开始想念家乡,想念父母亲朋,开始细想大都市和小县城的差别,细想我想要的是什么。

在我的认知里,农村的家庭都非常尊崇传统礼仪,虽然谈不上更高的层面,但是尊老爱幼的规矩始终如一。相比于城市的独生子女家庭,农村逢年过节,好吃好喝的一定是先端给长辈;平常吃饭时也不能说笑打闹,在这“规矩”氛围下,即使再娇宠的孩子都会挨骂或挨打,更别说诸如晃腿呀、大笑呀什么的小不雅。我的意念里,至今都敬畏着这种即传统又淳朴的家风,坚守着这种长幼序、友与朋的美德。

在我的认知里,善良是农村人的又一个显著标签,村邻之间的互相帮助,亲情之间的互相走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活好人”,虽然这是一种朴素的善良,但是闪耀出了人性的的光芒。这种善良在我的人生观里,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让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对待何人,无关利益大小,只要做到了就认为值得,做好了就是自豪。

在我的认知里,很少有东家长西家短的八卦,基本上都是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他们明白勤劳是改变生活的前提,耕读传家是实现梦想的执念,一辈一辈人用辛勤劳作诠释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都市人的生活,人们追逐更多的是外在的富足。撇开用不正当手段去获得不义之财这个话题,单就日常生活而言,大都是能用金钱满足的就不想再费神费力。虽然吃喝不愁,但是却感受不到物力维艰的敬畏,品尝不到生存的纯真滋味,忘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内在力量,没有把磨砺当成生活的磨刀石,没有把正确的三观当成精神上的钙。这是在都市生活我得到的认知。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哲学问题,以我的功力和学识还无法企及,但思考一下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还是可以的。

喧嚣的都市,生活节奏带给我的是窒息,我想要的,是乡村那种淳朴的气息,可以放任地呼吸。钢筋混凝土包裹的城市,人与人是冷漠的,邻居之间陌生到不知各自姓名,同处一城的父母也只有用“常回家看看”来互相安慰,我想要的,是乡村那种人间烟火气,乡邻之间的人情练达。物质供应丰富的城市,高额的房价,孩子的教育,就业的艰难,是三座压在日子上的大山。我想要的,是乡村那种随时都有的喘息机会,随时都有的属于自我的安宁。随着年龄增长,身边越来越多的分别是,这是生命规律,但情感上越长大越害怕生离死别,我想要的,就是和父母仅仅只是一碗汤的距离,而不是一根电话线的距离。人们常说:“子欲养而亲不待”,但是遗憾是何因造成的又有多少人去细想?每天都能见到爸妈,吃上他们做的饭,听着他们的唠叨和生活的琐碎。每逢佳节,都能和父母团聚在一起,这种生活中最简单的又是最难得的幸福,在城市常常成了一种奢求。我常常也在思考一个问题:知识和文化是一回事吗?我的理解这是两码事,知识是书本上得来的,文化是社会上传承,这两者的共性应该都是需要沉淀积累的。城市里有众多的人是硕士、博士毕业,不可谓没有知识,但就有人处理不好家庭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婆媳关系,整出不少遭受道德谴责的事情,而反观农村,许多大字不识的老大爷老奶奶,他们却是世事练达,把人情世故处理得妥妥帖帖,这显示出的是有文化。有人认为是杠精,说都市和农村都有这两种人,我不反驳,只要大家能明白我想说的其中道理,我当回杠精又如何呢!

一个人开始喜欢回忆过去,就证明他老了,但是我不认为我是老了,我认为我是生病了。生病的人从不认为自己有病,所以我之前寻找的原因是这个城市病了,但最后我才发现,人人都喜欢都市生活,追求都市生活,怎么可能是城市病了?那就真的是我病了,而且得的是心病。

缅怀英烈 学习劳模 不忘初心 再立新功

1947年7月下旬,胡景铎赶到张家畔西北野战军总部,参加攻打榆林的战斗。

榆林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是陕北的军事重镇,从1916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带兵进驻后,在军事上一度控制了23个县,解放战争初期驻军达15000余人,是国民党军队包围、侵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据点和前哨阵地。在抗战时期邓宝珊出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后,榆林和延安一直维系着比较好的统战关系。在横山起义一个月后的1946年11月15日,邓宝珊在接到秘密前来会谈的罗明转交的胡景铎的书信后还说道:“老六起义应该让我知道才好,他现在是否回关中,我意让他和杨拯民都回关中,比较有前途。”邓宝珊的这一意见实际和仲仲的考虑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杨拯民是杨虎城的儿子,在1947年2月即出任骑六师副师长兼党委书记,和胡景铎带领骑六师转战陇东、关中带。

1947年7月至11月,西北野战军为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北上,力求在运动中歼敌一部,将其牵制在陕北地区,配合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接连两次攻打榆林。第一次攻打榆林发生在8月6日至12日,在调动胡宗南所属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六师北上后,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围。此役守得顽强,攻得猛烈,据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榆林和平解放》一书记述,“城墙外炽热的炭笼,几十米处照得通明,敌我双方战斗到白热化”,“此次战役,我军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3200余人,共歼敌5200余人,我军伤亡1890人。”

第一次攻打榆林撤围后,胡景铎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政府等机关渡过黄河,于9月移驻山西省三交、柳林、离石一带,时边区各机关、部队都把后方放在这里,设有留守处或办事处。胡景铎带领张怡祖、萧景寿、黄福初等人住在柳林镇外清河南岸的康家沟村。据胡景铎回忆:“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榆林未打下,因敌援兵来到而撤围。我和司令部人员及边区政府等机关过黄河到山西离石、柳林去了一趟。各部队的后方都在那里。我的家属也住在那里。”

就在胡景铎到柳林后不几天,就发生了骑六师后方留守处开设的商店被柳林税务局没收了一批较为贵重的物资,留守处的负责人张立山带着商店里的人,并叫上胡景铎的警卫员,持枪到税务局把被没收的东西又夺了回来。这一突发事件,成为令胡景铎痛惜不已的“罪恶事实”。他在多年后的一份回忆材料中就此事做了尽可能详细清楚的叙述:

“我在1947年9月间第一次打榆林的战役以后,和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同一时间到山西三交、离石、柳林一带后方去了一趟,当时同去的人有萧景寿、郭子明、吴子芳、张怡祖、黄福初等人。我住在离柳林街五里处河南的一个姓康的村子里,回忆我到后五六天时,曾发生过我们师的留守处所开商店和柳林分区的税务局因没收商店的物资而发生冲突的事情。当时后方留守处负责的是我师供给部的科长张立山,在发生事情的当天12时前,联防司的副主任徐磨和科长向和我处说:‘你们留守处的商店和柳林税务局发生了事情,税

务局没收了你们商店的物资,你们的张立山叫商店的人持枪到税务局抢夺回来,听说还有你的警卫员参加。’(这时商店已有几个人被扣了)他们得知这是张立山主使的。12时,我和徐等人一同去柳林街上见了联司王维舟司令员和分区陈刚副司令员,他们说:‘这件事你不知道,张立山一概清楚,你把张立山送来,只要他承认了问题,我们教育一下,他是受商店的一些坏人挑唆干的。’我回来后,当天晚上以前,叫张怡祖把张立山叫来问了一下,商店里的人是他叫去的,他向警卫员郭子明说过:叫几个人一起去。当时的处理是第二天叫张怡祖把张立山送到柳林街上陈刚所在的缉私处。郭子明、肖景寿、吴子芳等人在这时就跑了,他们是跑回前方部队去了。这是以后前总告诉我的。张立山经过交代问题以后释放恢复工作,事隔两年后他在四川剿匪战役中阵亡了。商店里的人开除了几个,个别的也是法办的(那是因为还有其他的恶债)。”

“我是受了严格的批评。当时指出两点:(1)对张立山和警卫员教育管理不严;(2)事情发生后处理不主动,不及时。至今想起来是愧悔之极,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当时联司首长和柳林分区陈刚副司令员是按破军军纪处理的,主要责任在张立山和商店里个别坏人身上。虽然没有给我处分,但是检查起来自己责任不小。警卫员郭子明、肖景寿等人私自参与此事(这是分区查明,张立山也承认),管理他们的副官事前也不知道。虽然当时上级宽大,分别对待,对他们没有进行较严肃的处理,但其性质是违反政府法令和军纪的。以后他们

的逃跑,我认为是因把张立山送去,是属畏罪跑回前方部队的。

“至于说到他们当时的情况,并没有人经常苛待他们(比如说,对他们严重的打骂吧)。那时已是供给制度了,战时随环境来生活,当然更谈不上扣他的饷(即是从经济上压迫他们)。他们也没有说过谁克扣了他们。”

“柳林事件”虽然得到及时处理,牵涉其中的几个人中,萧景寿等人深受教育,在此后的战斗和工作中一直表现优秀,主使者张立山其后也在四川剿匪战役中英勇战斗,光荣牺牲,但这起事件已经“破坏军纪”,令胡景铎多年后依然“想起来是愧悔之极”,认为“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胡景铎在柳林停留了一个多月,10月底前随联防军司令部移驻绥德县义合镇边家川。其间,西北野战军组织了第二次攻打榆林。在第一次攻打榆林后,西北野战军于当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取得了沙家店、延(川)清(涧)、黄龙等战役的胜利,认为再次集中主力进攻榆林消灭第二十二军,进而解放神木、府谷,既可扫清北线,又可为南下创造有利态势,决定第二次攻打榆林。第二次攻打榆林发生在10月27日至11月16日,在调动宁夏马鸿逵部35000余人东进援榆后主动撤围。据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榆林和平解放》一书记述,“此次战役,共歼敌6800余人,我军伤亡4300人。”

接连两次攻打,虽未攻克榆林城,付出了较大代价,但对榆林守军以重大杀伤,随着解放战场形势的发展,已使榆林方面陷入了孤城

《胡景铎传》(节选之十四)